

周文琪 著

史 镜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19 — 1991）

国际共运史既是一面明镜，也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教科书。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个相当复杂而特殊的重大历史课题；是曾经影响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世界体系重大格局和全球大国战略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文琪 著

史 镜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19—19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19—1991）/周文琪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04-9829-2

I. ①史… II. ①周… III. ①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531 号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吴 健

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它曾经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我国全球战略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外交外事决策，而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和相互对策又是其中的核心。双方相互关系的好坏及其转化过程，这无论对中苏两党两国自身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然而，这一重大研究课题在中共党史领域却长期被“禁锢”。直到1981年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扼要指明了这一问题后，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终于有所突破。

周文琪同志长期在中央党校搞党史研究工作。早在1981年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和湖北省委党校，初步作过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并先后被印发。1981年6月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以后，原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即在《理论资料》专刊（1982年1月）全文发表了上述报告。

之后，从1982年至今20余年间，周文琪在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档案馆（国民党档案）、苏联解体后解密档案以及有关报刊等方面广泛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他陆续出版过多部专著，其中有影响的是50余万字的《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以下简称《特殊而复杂的课题》）一书；另一部是《李德与中国革命》。后者出版后，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专家格里戈尔·本顿著文说，《李德与中国革命》一书是对李德有“新的了解”的一

本“重要的书”，它为“确切地研究布劳恩（李德）在中国的岁月打下了基础”（1989年6月英文版《中国季刊》第118期）。1993年，德国“苏联、东欧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亨兹来中央党校，就《特殊而复杂的课题》一书对作者周文琪进行了专访。

除上述专著外，20多年来，周文琪还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专著性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为《周恩来与共产国际》、《析苏联对盛世才的政策》等。后文发表于1989年《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这是个很少研究的冷门课题——共产国际、苏联与新疆的关系问题。文章发表后，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曾彦修致函中央党史研究室原领导廖盖隆同志，说“该文（对此问题）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盛世才在新疆的十年统治，其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探索，值得写出全面专著，本文作者具备这个条件，特此建议”。

1995年6月16日上海市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党史信息报》在其“史林学者录”栏目里评论周文琪的学术生涯时，说他“是目前国内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与苏联关系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1991年苏联丧失政权的严酷现实，对这位长期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人来说，震撼极大。因而他继续收集、阅读研究了大量苏联“二十大”以后的有关资料。经过研究，周文琪认为苏联的解体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引发的一个复杂的重大政治事件。它包括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党内因素和党外因素、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等等。但是，作为苏联国家和人民脊梁的苏联共产党，作为曾经支撑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钢筋铁骨”，其内部的蜕变，无疑是导致这座大厦最终迅速倒塌的最主要因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表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我们党应从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复杂的史实中，深刻汲取教训。因此，周文琪把此次完成的这部著作定名为《史镜》。

周文琪今年已逾八旬，他真是离而不休，在精心照顾有病老伴之际，仍耕耘不已。我坚信：今出版的《史镜》一书，不会是他的封笔之作。

前 言

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功用，虽不像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到现行政策和国计民生，但学术变迁史一再表明，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其道理很简单：人们渴望从历史的反思中获得种种启发和借鉴，求训致用，以补益于现实社会。因此，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今天，不少学者的研究视线转向了对近代史上中外交往过程的分析考察，而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史，就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课题。

1919年3月，列宁亲手创建共产国际，从成立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历时近1/4个世纪。它作为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方针、路线对各国共产党、各国革命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它解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仍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解散，始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都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不顾或忽视这一内容极其丰富、而其中许多事件的因果关系又极其错综复杂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党史方面的许多问题就会说不清楚。

列宁初创共产国际的那5年是正确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中国革命是主要的，但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①

历史唯物论对人对事的评价应该是对历史起了促进作用还是倒退作用。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对手，以敬畏的口吻评价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如果再加上一句：“他创造了一个震撼世界的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他在前进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也丝毫不能掩盖其众所周知的光华了。

对毛泽东的评价亦应如此。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最高领导集团大致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过渡时期，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时期。

但是，自赫鲁晓夫伊始的苏共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苏联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中国共产党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关系曲折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党两国关系曲折复杂、扣人心弦且具有悲剧色彩，由肩并肩的盟友变成了对立方，发生180度大转弯，这无疑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而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又是其中的核心。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两党两国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关系的好坏及其转变过程，无论是对中苏自身，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都产生了巨大和深刻的直接影响：

^① 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一 直接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中苏关系由好变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不复存在。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

苏共和中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处于执政地位的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中共党员人数最多，苏共历史最长。中苏两党关系直接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苏共和中共多年的团结合作，使自 19 世纪 40 年代兴起的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西欧逐步扩展到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到高潮，成为影响时代的“最大政治力量”^①。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大的曲折，由统一到分裂，从高潮到低潮。造成这种逆转的原因很多。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爆发的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苏两党的影响和作用下，全世界 80 多个马列主义政党几乎全部卷入中苏公开论战之中，加入一方，批判和攻击另一方。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场由中苏两党牵头、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1965 年苏共召开莫斯科三月会议，中共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拒绝参加，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政治路线和理论观点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复存在。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转。

二 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兴衰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友好，两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苏联在自身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根治的条件下，对华提供大规模的援助。这种援助不是无偿的，却是真诚的。^②这在帝国主义对华严密包围、封锁的情况下，更是雪里送炭。支持是相互的，中国在外交上全力配合苏联，在

^① 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6 日。

^②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0 页。

经济上向苏联支付硬通货、出口农副产品,输送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对苏联也尽了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的岁月里,两国综合国力都在增强,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苏联、苏共领导集团由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恶性膨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对中国施压,并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这样在与自己主要敌人美国对抗之外,又一步步地把中国这个盟友变成了新的敌人,从而在战略上陷入美国与中国的两方面夹击之中。毛泽东早就料到陷入这种战略格局中的苏联“会输的”^①。

当中苏由盟友变成敌人时,为了防止美国和苏联的进攻,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搞三线建设,实行“散、山、洞”方针,接着又在广大城市“深挖洞”,大修地下防空工事,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与此同时,在国际上针对苏联开展反修斗争,并把这种斗争从国际引向国内,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催化剂,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中苏关系好,两国兴;中苏关系坏,两国衰。中国由于邓小平的改革主要是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主动改善对外关系,包括与苏联关系,很快摆脱困境,走向兴盛。苏联由于改革失败,在1991年解体。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苏联共产党,这个有93年历史,拥有15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不仅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同时也结束了自身的生命;随后,连同它一起葬送的还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们应从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复杂的史实中,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地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这正是撰写本书的宗旨所在。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

^① 见毛泽东《同希思的谈话》1964年5月25日。

是。作者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经，以事实为纬，分为“列宁亲手创建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初期”、“共产国际中期”、“共产国际后期”、“斯大林晚年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等8个阶段，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等三个方面入手，研究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对抗的历史演变过程，据此分析导致发生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这对于我党我国今天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复杂的国际形势，正确看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发展及其前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应当是一本富有哲理的教科书。

目 录

序	吴 健 (1)
前言	(1)
一 列宁亲手创建的共产国际	(1)
(一)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的一般概况	(1)
(二) 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	(3)
二 共产国际初期(1919—1927)	(5)
甲 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5)
(一)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 维经斯基、马林等 先后来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5)
(二)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及其对 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7)
(三) 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促进国共合作, 是共产国际在 中国的一项战略决策和重大贡献	(10)
乙 推动 1925—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功过	(13)
(一)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失误	(14)
(二)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	(16)
(三) 共产国际初期, 国际的集中制和中共要求独立自主的 矛盾就已有显露	(26)
三 共产国际中期(1927. 7—1935. 7)	(33)
(一) 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	(33)
(二) 共产国际“六大”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37)

(三)王明路线实质上就是国际路线	(39)
(四)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	(45)
(五)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内临时中央的关系	(49)
(六)共产国际“七大”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57)
(七)共产国际中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失败的教训后 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64)
附:左尔格与中国革命 ——一个传奇人物	(67)
四 共产国际后期(1935—1943)	(77)
(一)第二次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	(77)
(二)苏德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基本政策	(82)
(三)共产国际、苏联帮助新疆盛世才建立统治权的实质	(84)
(四)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解散	(94)
(五)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后期,中共既肯定国际的领导,又 正确处理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干涉,奉行独立自主路线	(98)
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及其《延安日记》	(102)
五 斯大林晚年时期(1943—1953)	(110)
(一)雅尔塔会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10)
(二)拆运中国东北工业的战略意图	(115)
(三)斯大林派米高扬密访西柏坡	(116)
(四)刘少奇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做自我批评	(123)
(五)毛泽东首晤斯大林	(128)
(六)斯大林与“抗美援朝”	(137)
六 赫鲁晓夫时期(1953.3—1964.10)	(147)
(一)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示好 (1953—1955)	(148)
(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 ——两国两党分歧渐次加深	(153)
(三)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后的震荡	(159)
(四)1957年莫斯科会议	(166)

(五)“长波电台”、“共同舰队”风波——中苏关系 由好变坏的转折点·····	(175)
(六)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三道四·····	(179)
(七)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	(185)
(八)中苏分歧蔓延到对外战略方针上·····	(189)
(九)从战略利益冲突到意识形态论争的四次交锋·····	(199)
(十)空前激烈的两党公开论战,赫鲁晓夫下台·····	(221)
七 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 10—1982. 11)·····	(227)
(一)勃列日涅夫上台,贯彻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227)
(二)《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	(233)
(三)苏方公然煽动颠覆毛泽东对中共的领导·····	(236)
(四)中国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238)
(五)珍宝岛军事冲突·····	(241)
(六)苏联企图战略包围中国·····	(245)
(七)中国开始构思对苏反包围新战略·····	(247)
(八)漫长而曲折的中苏谈判·····	(253)
八 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 3—1991)·····	(258)
(一)从中苏关系有所改善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恢复正常化·····	(258)
(二)戈尔巴乔夫变改革为改向——苏联解体·····	(263)
九 苏联共产党痛失执政地位的教训与启示·····	(275)
(一)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75)
(二)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276)
(三)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276)
(四)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276)
(五)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277)
(六)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还警示我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全党的团结, 倍加珍视团结·····	(277)
(七)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278)

一 列宁亲手创建的共产国际

（一）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的一般概况

1919年3月2—6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30多个国家工人政党的代表。俄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契切林等。列宁宣布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共产党作了报告，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援助……我们将继续认为，我们有义务支持每一个承认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人运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来办理，这个执行委员会由俄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党选派一个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选出5个人组织政治局（执行局），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普拉廷、拉科夫斯基等（他们都是俄国人）。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共产国际就这样产生了。

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先后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有执行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来处理 and 解决共产国际日常事务。执委会下面领导西欧党的是西欧局，领导中东、近东、远东各国党的是东方部，直接领导中国党的是东方部的远东局，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因此又称伊尔库茨克局（达林称为“远东书记处”）。

从共产国际成立到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期间，为时七八年的共产国际主席是季诺维也夫；第七次全会决定取消共产国际主席改为政治书记处之后，第一个政治书记是布哈林，1929年7月国际执委

第十次全会把布哈林开除之后，库西宁和曼努意斯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则是季米特洛夫。

从共产国际“一大”起，每次大会都有中国代表或代表团参加。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中共成立之前召开的，当时中俄交通刚刚打开，共产国际还不能或来不及邀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出席大会，而由侨居在俄国的华工组织派人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

共产国际“一大”是1919年3月召开的，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中国代表是刘绍周和张永奎。刘绍周又名刘泽荣，是“华工联合会”的主席，张永奎是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华工联合会”是十月革命后在旅俄华工中很有影响的组织，于1918年12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联合了各地原有的旅俄华工中很有影响的组织，有四万至六万会员。在共产国际“一大”第四次会议上，刘绍周向大会读了祝词，并多次同列宁会面。

共产国际“二大”是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开幕的，7月23日移至莫斯科举行，至8月7日结束。刘绍周、安恩学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所代表的组织是“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

所谓“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据苏共马列研究院档案材料记载，它“是俄共（布）外国部的组成部分。1920年7月1日俄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它是侨居苏联的中国党员组织的唯一中央机构”。它“从一开始活动就同共产国际建立密切联系”。1920年7月，组织局向共产国际执委提出要求准予派遣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共产国际执委满足了这一要求，于是两名中国党员、组织局的代表列席了大会。

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刘绍周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发言，并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还有瞿秋白。他是1920年10月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的，1922年2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在大会发言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对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严重危害，要求共产国际和各国支部对远东、对中国革命运动给予更大的注意和更多的援助。

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的是陈独秀和刘仁静。刘仁静代表中共在大会上讲话，主要表明中共要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李大钊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并发了言。他在列举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的侵略罪行之后，指出中共在民族革命斗争中按照共产国际“四大”所通过的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决定进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参加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8月17日—9月1日）的中共代表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等。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王明、康生和林育英等参加了大会。

此外，中共在共产国际有常驻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向忠发，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到1931年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黄平、余飞等组成。王明等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后，王明、康生就取代了瞿秋白等。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曾担任过短时期的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共产国际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比如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各国党要统一和协调行动，季诺维也夫在会上极力坚持要实行集中制，坚持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集中统一的党。

另外，在共产国际范围内，俄国党实际上处于一种领导党的特殊地位，联共（布）党内的的问题往往可以不列入国际的议程，从而遭到一些党的反对。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全会上曾几次讨论了俄国党在国际中的地位问题，但季诺维也夫说：“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功，就必须保持历史经验最丰富的苏联共产党的影响。”

由于这些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不正常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

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大多数是围绕苏联党内斗争而展开的，但它

直接影响到各国革命的发展，这特别明显的反映到中国革命的问题上。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集结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反对联共（布）党、反对斯大林。托派分子拉狄克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和斯大林展开争论，提出19世纪以后的中国经济结构已经不是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由此出发，他反对斯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对封建的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反对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显然是托洛茨基在大革命的武汉时期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打倒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的理论根据。为此斯大林曾亲自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和反封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27年5月召开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正是中国革命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托、季联盟对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反对纲领。当时和托、季联盟的斗争主要是反“左”，因而直接反映在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是更加强调联合，而忽视斗争。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前后，斯大林又开展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共产国际“六大”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苏联在国际间的地位就更为重要。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一直担心以日本、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因而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并要求把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例如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蒋介石怂恿张学良从苏联手中夺回全部铁路管理权，中苏断交。这时共产国际在给我党关于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中，要求我党号召群众“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同时还指示我党要显示军事威力，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

当时，布哈林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要严加戒备，但主张应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斯大林反对布哈林这种见解，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由于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右倾结果，使1929年中国刚刚结束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之后，又跟着反右，结果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